



徽州典商：无徽不典 遍布全国

在中国典当发展史上,不得不提到徽商典当。徽商典当与晋帮票号一度成为当时国家的两大金融支柱。在具有一定商业资本积累以后,精明的徽商开始向金融资本渗透。明清时期的徽商典当就以其规模大、分布广、获利多最为著名,当时民间广泛流传“无徽不典”之说。

朱玉婷

典商多为休宁人

徽州典商遍天下,从繁华都市到县城集镇,到处都飘扬着徽商典铺的招幌。明清时期北京城内典铺众多,绝大多数为徽商、晋商所开。北京徽典之多,以至徽州方言竟成为了北京当铺通用的行话。南京更是徽典聚集之所,明后期南京城内的500多家当铺大部分为徽商所开。在长江中下游的沿江,每个城镇几乎都有徽州典商。

休宁有个典商“吴百万”

徽州业典人数众多,不仅出现了一批业典世家望族,而且还出现了区域性典商群体。

休宁商人几乎视典业为他们的专门职业,世人称之为:“典商大多休宁人”。休宁的商山吴氏,自明中叶以来就经营此业,以至“家多素封”,声势显赫,是休宁著名的望族。明代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商山吴氏有个大财主,拥有家私百万,号称“吴百万”。这个财主就是经营典当业的“大朝奉”。

徽商也多热衷于经营典当业,据歙县县志上记载:歙县商人经商以盐、典、茶、木为最。歙县许姓家族就是一个十几代业典的典商世家,资本多达数百万,开设的当铺达40多所,遍布于江浙各地,所雇员工不下2000人。歙县的岩镇,在明末就号称钱家之藪,致使该镇成为富甲一方的都会。徽州其他各县以典为业者也不乏其人。

发迹后渴望“钱生钱”

徽商中有不少人出身贫寒,最初的经营资本来源于自家房屋,或者妻子的首饰,甚至是衣箱的卖价。做了几笔买卖之后,又想把生意做大,有的只好向典商去借贷。有了当初千辛万苦的经历,后来发了大财,也就有了放债的强烈欲望,这毕竟是“钱生钱”的最佳途径之一。他们放债的主要方式就是经营典当业,其实就是高利贷,城镇出现的当铺、银号都属于放债取息的经营方式。

明清徽商之所以如此痴迷于广开典铺,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典当业风险较小、获利丰厚。而典业税额极低,也是刺激徽商投资典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百万之资也散尽

明清时期,徽人典商的资本之巨是其他商帮所难以比拟的。在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就有记载。

歙县人许翁,世代经营典业,家中巨富。遗憾的是他的儿子们不争气,常常干出些违法的事来。官府以“豪横乡里”的罪名派人持文书来逮捕这名纨绔子弟,行贿求免,才免于—罚。

几个儿子一看家乡待不下去了,就四处远游,在其家所开当铺之处,肆意取钱挥霍。该处的典铺就要遭殃,各处掌柜纷纷派人送信给许翁,告知此事。许翁无奈,只好写信通知各处典铺,定于某月某日,同时关闭,企图以此来阻止儿辈的任意挥霍。

可典铺中的掌柜、伙计们不满了。最终,按典铺之大小,管事者每人给1000两至2000两银子,以此递减,至厮役扈养也皆有份,最少者也给钱十两。许翁共有40多所典铺,人数几及2000,各人都如数拜领而去,而许翁“数百万之资,一朝而尽”。

张亚琴



▶ 徽商开当 遍及四方

据《明实录》载:“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三十年。”又据《嘉兴县志》记载,安徽的“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又以农田为拙业,每以质库居积自润”。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经理)称为“朝奉”一词也源自徽商俗语。《古今小说》、《拍

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人和事均取材于徽籍典商。

而相关史料也记载:清代侨寓扬州的徽商吴某,“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有其右者”,号称“吴志典”。清代徽人汪已山,其家侨寓清江浦200余年,“家富百万,列典肆,俗称江家大

▶ 典当业成为徽商四大行业之一

徽州人经营典当业发展成为徽商四大店业之一,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本家。上海9个钱庄资本家中就有一个是徽州人。典当业是徽商经营仅次于盐业的行业。明清

▶ 典当商属于徽商“上贾”

徽州典当商属于徽商中的“上贾”,资本极为雄厚,在竞争中,他们联合族人乡党集中于一地同治典业,以较低的典利排挤其他商帮而占领市场。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

▶ 分工精细 各司其职

徽州典当商在内部管理上很有特色,主要是分工精细,制度严明。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1至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

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

“柜台先生”统称“朝奉”,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典当店铺开业,必经朝廷核准,也就是“奉旨经办”,谁也不得借题滋扰。“柜台先生”对货物鉴别眼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

门”。明末休宁人孙从理,在浙江吴兴一带经营典业,“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前后增置典铺上百所。清代歙商许某,累世经营典业,资本多达数百万,家有“资物之肆四十余所”,布列于江浙各地,各典肆的“管事”以及“厮役扈养”共计不下2000人等等。

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典铺以解燃眉之急。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因此,徽州典业迅速发展起来。

当时,徽商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比拟的。徽商程壁治典于江阴,清兵南下时,为支援军民守城,先后捐银竟达175000两之多。

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他们还老于世故,与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打交道,很会察言观色,相机行事。“柜台先生”收当货物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

余氏当铺：华东地区最大的典当铺

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强大的商帮之一,在商界称雄二百年,势力高峰时期,“无徽不成镇”。从明末以来,当铺基本是商人开设,再没有寺院开设的。而跨出省门到外省开当铺的,则首推明末徽商,所谓“徽商开当,遍于江北”。相关史料记载,在江苏千灯镇有着目前华东地区保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这就是当年休宁徽商余爱山第二代传人余尚德在当地所开的余氏当铺。

朱玉婷

100多间堪比迷楼

余氏典当的老宅朝东落西,双排两行,建时沿河自东向西共有7进,现存五进。整个建筑群有个明代大厅、五个小厅、六幢楼、双备弄,前后左右构成“亚”字形“走马楼”,大小房屋120多间,千灯人称它“迷楼”。典当行三面有高墙,确保财产安全;后面是“更楼”,可以为全镇防盗、防火打“五更”,具有警示功能。

主顾皆因穷途末路

在余氏典当,你会发现和所有当铺一样,它的柜台很高,基本都在1.8米以上,上面设有栏杆,它的作用主要是保护内部情况不为外人所知,柜台里有两位人物的蜡像,趾高气扬的是店小二,板着脸的就是朝奉先生了(相当于业务经理)。当典当者递上物品时,就听凭当里朝奉先生居高临下吆喝开价,不能还

徽商余氏曾显赫一时

余氏典当是余爱山的第二代传人余尚德于清顺治年间在江苏千灯镇上营建的徽派建筑群。余爱山在明万历年间(1619年)从安徽的休宁县到千灯吴家桥经商,通过父子两代创业,积蓄后成为富翁,并在此建造徽派建筑群,沿街设店铺、当铺,往里延伸为住宅等。

第一进东为店铺,四开间门面,经营茶杂山货,西四开间为典当铺。这也是收兑典物的场所。大门内上方是清代特色的砖雕,上面有“积善馀庆”四字,古语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余氏家族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多做善事,便能年年有余,也是对自己家族寄予美好的愿望。后面几进则为主人居住的地方。余氏当铺,风雨沧桑三百多年,依然如故。

价,他们一般都会用专业术语。

把好的东西说得一文不值,以此来压低价钱,学徒进当铺第一学专用语言;第二学开当票。古时候有“穷死莫去当,屈死莫告状”之说,上典当的主顾都是穷途末路的人或其他应急者,这是他们面临经济破产的时候才来的场所。

余氏家族,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曾经是千灯镇上“南顾、中余、北叶”显赫的三大户之一,亦是人才辈出的礼仪之家、书香门第。余爱山的第三代传人余国柱,于顺治丁亥年高中进士,官至刑部主事,江西清吏司郎中;顺治丙戌年,余国柱和他的侄子余震元同入“科校场”考场,同登一榜,乡里传为佳话。